晦侬往事

周素子　著

生活·讀書·新知　三联书店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目　录

海燕其归来乎？ / 周有光
读出了蔡元培 / 沙叶新

第一辑
故　乡
3
节　日
8
衣　食
14
凉　茶
20
母　亲
23
毅哥米哥
33
二　姐
45
义　仆
63
三个女儿
72

第二辑

辗转的户口

85

捡破烂与学针灸

108

求学记

115

西域探夫记

125

患难中的三位女友

133

留下镇友人

138

河头人物

144

河头轶事

164

后　记／陈朗

174

海燕其归来乎?

周有光

几年前，素姐自奥克兰致函邀任我为其“新西兰汉学会”荣誉顾问，使我深感荣幸，曾向她表示谢忱。今复以其所著《晦侬往事》书稿征序于我，更因感荣幸而义不容辞。

我与素子伉俪相交已有半个世纪，初见素子时，她还是个大学生，当允和等在俞平伯先生出面组织北京昆曲研习社期间，彼此夤缘而相识。二人当时还不是曲社的正式社员，未像允和那样的“投入”，像我一样只是曲社的“边缘”人，后二人离京，中间隔断有二十年之久，他们长期处于颠沛流离中。朗兄原是京城“戏剧圈”中人，曾任《戏剧报》编辑，允和所作记叙昆曲“全福班”的《奇妙的江湖船队》，首先是他拿去发表于他所执编的《戏剧论丛》上，这是“文革”后他返京“复职”时。但只要他俩在京期间，则为我家的“常客”，堪称“莫逆”。但命运使他们远遣他乡，我们不相闻问的时日漫长。素子作为她个人，她的经历更为艰难。难处存言，本书是也。作为回忆，自叙平生，不曾出于凄楚之情，相反，却是一片美好，具有人性的至善至美。虽则零章断篇，却如昆曲的每支曲，其间离合之情，风云际会，也是一本“传奇”，也是一种“奇妙”。

处于二十世纪中期的中国知识分子，包括青年学子，无不经受严重的考验，经受到精神与肉体的磨炼。一九五七年，素子这个大学未毕业生也不例外。朗兄也是个不谙“世事”的书生，虽比她大十岁，自身不保，焉能保护她？不像二姐允和，尚叨身为家属身份，以之“安身立命”。素子先随朗兄播迁塞外，当朗兄被投入遐荒，她随即被

遣出兰州市，挈带三个未成年的女儿，先而踯躅于古秦川道上，再而流徙到江南农村，与朗兄被迫劳燕分飞。我们的宗先辈北宋词人自称“憔悴江南倦客”的钱塘周邦彦，在其《满庭芳》词中有句云：“年年。如社燕，飘流瀚海，来寄修椽。”素子一天也没从过政，但她确也到过瀚海之边（见书中《辗转的户口》、《西域探夫记》等篇），最后于杭州近郊的村店当“伙计”，以不“憔悴”之身谋生，然不忘读书，钻研学问，苦心孤诣，向往、追求不懈，艰辛地抚养女儿成长。这只生命“小舟”竟不破不灭。等到“落实政策”、“改正”，已到中年，然犹壮心未泯。过去为学生时，学的是洋乐，走的是“白专道路”，然二十年来虽挣扎于社会底层，学业早经荒疏，幸赖有家学并自学的根柢，于是能胜任大专的汉语教师并杂志编辑。其间还以“业余”身份受聘于首都“昆曲艺术研究学会”的副秘书长，以遂年轻时即热爱而欲拯挽的正声之失坠，为之尽绵力之心，又投身徽学、民居学的研究，深入古徽州若干次，走访全国传统民居百十次，因从事风景名胜事业，走遍了名山大川，处处留有足迹。如今身居海外，犹从事华文报刊的文事，并致力“汉学会”事业，系情于故国未止。

书称“晦侬往事”，实包涵故园、故国之意。举凡家人父子、亲友故交、师长前辈，并向之所接的村民船户、卖浆者流，山川草木，无不在追忆之中。结念之深，给人以“归来”之感。前些年，我曾给素子伉俪的复信中说过：“你们是尘世不容的仙侣，被中原的浊浪冲出人寰，遨游于茫茫神空，降落于海外仙岛，居然落地生根，蔚然成林。真是，天涯何处无桃园！”这几句话，今天有新的诠释：浊浪若非久长，大禹的子孙终能学治水，顺从世界的潮流，趋于完善。桑梓之地，人文渊薮，故园何尝非桃园，布帆无恙，生命之舟犹能旋，海燕其归来乎？

在这里，还必须一提允和等与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余英时先生之间的“不须曲”故事。一九六八年，充和在哈佛大学演出昆曲《思凡》和《游园惊梦》，余先生观后曾感赋一绝，后二句云“不须更写还乡曲，故国如今无此音”。盖当时大陆“文革”正进行得如火如荼也。相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隔十年，此诗经充和寄与在大陆的允和，当时充和未提作者名，只说“有人”，得到允和并北京昆曲曲社诸友的相和，允和和了二首，其第一首后二句为“不须更写愁肠句，故国如今有此音”。盖允和正于是年春在南京观看了由江苏昆剧院演出的《牡丹亭》之后。因诸和诗均用了“不须”两字，故充和称之为“不须曲”。后来当然得知首唱者即是余英时先生，且于该年十一月在北京机场，允和同我与余先生有了一面之缘。此一事，直至大前年二〇〇六年，余先生为我的《百岁口述》一书作序，竟将之作为序题《不须曲的故事》，于序文中做了回顾，且谓“无巧不成书”，说“二〇〇六年五月忽收到新西兰周素子女士的一封信，附有她最近写的《记当代才女张允和女士》一篇文稿，文稿记述‘不须曲’发生前后过程，借以证明一九七八年春天《牡丹亭》在南京演出是‘文革’后的第一次，是‘不须曲’的缘起及其具体的语境和事境”。因而认为：“‘不须曲’的唱和发生在太平洋两岸极小的文化社群之间，既不为局外人所知，更谈不上什么影响。然而作为一个小小的文化事件，它未尝没有一点发人深思的启示。时隔十年，地去万里，唱者和者初互不相识，却在顷刻之间共跻于‘心有灵犀一点通’的精神世界，这似乎显示：对于真、善、美的向往与追求确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这是永恒的人性，没有任何强大的外力能把它长期压下去。”于是余先生将这则“文字因缘”作为他为我书所作序文的“曲终雅奏”。我今援此“不须曲”这段小小的文事，将我与余先生、素子又融合其中，真是“无巧不成书”。今为素子书作序，亦正处于太平洋两岸，地去万里，时隔十年或更十年、廿年，而彼此心迹相同，亦将之作为我写序文的“雅奏”。

二〇〇九年元月

周有光

时年104岁

读出了蔡元培

沙叶新

今三月十七日，香港的浸会大学在该校举行每年一度的“蔡元培节”，该校曾演出过我的剧本《幸遇先生蔡》的片段，所以今年的蔡元培节他们邀请我来做一次演讲。此剧原是应邀为北京大学的百年校庆所写，二〇〇五年初上海话剧艺术中心也曾排演此剧，但都遇到麻烦，夭折了。倒是香港专业剧团（中英剧团）和业余剧团（浸会剧团）顺利地演出了这出戏，可见蔡元培在香港和大陆的“政治待遇”大不一样，所以我在浸会大学的演讲题目是《今日已无蔡元培》，当然指的是今日在大陆已经没有了蔡元培，没有了蔡元培的教育精神，没有了蔡元培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有的只是越来越严重的教育弊端。

我在浸会大学演讲蔡元培时，居然有北大校友会香港分会的近三十名北大老校友前来听讲，他们都坐在前面的一、二两排，我从演讲台上望下去，只见他们每个智慧的头颅上银发飘拂，和后座的莘莘学子的满头乌发形成强烈对比。这让我顿生感动，好像眼前那一望无际的肥沃黑土，顷刻间便覆盖上皑皑白雪，那么丰厚，那么沧桑，却又呈现出丰收之后的恬适，休耕之后的安详；我想他们并非只是为我而来，他们更主要的是为蔡元培而来，是老校长的精神感召，让北大的这些老校友，和“浸会”的这批年轻的大学生，以及我这个上海的一介书生，得以共同聚集在这香港自由的天空下，一起重温蔡元培这位古今完人、现代孔子的高风亮节。

我演讲的那天中午，香港田园书屋老板黄先生请我饮茶，并请了从新西兰到台湾路经香港的周素子女士一同前来。我和周女士素未谋面，

查我当天日记，曾有这样的记述：“我和周一见如故，交谈甚欢。同是天涯忧国者，无言一握也知音。”最近读到周素子的新作《台湾观选追怀五叔》，她也提到我们的这次萍水相逢：“到港的第二天，他（田园书屋老板黄先生）请我在茶楼饮茶。次日又来电话，说介绍一位朋友给我，见面之后方知是沙叶新先生，是我久钦而欲识荆者。……第三天（十八日）我登机赴台北，在机上念及昨听沙叶新先生谈蔡元培，联系到此次想在台北寻找五叔足迹，忆起陈朗（周女士的丈夫）平日所收藏的近、现代名家书札手迹中正有一件蔡元培致五叔的短札，昨日茶饮中何不作为话题，向沙先生求教此信之时代背景，以释疑点，因感遗憾！”

又是蔡元培！

蔡元培的这一短札，我肯定未曾见过，蔡元培的全集中也不一定收录，周素子能忆起丈夫所藏名家书札中有此一柬，可见印象之深；并想向我“求教此信的时代背景”，亦见她对蔡元培手翰的情感之深。我这个人一向爱屋及乌，恨和尚也恨袈裟。年轻时简单，极端，并受当年思潮影响，曾说不喜欢马雅可夫斯基的“楼梯诗歌”和不被奥斯特洛夫斯基的自传小说所感动的人，我会与之断交，因为彼此无共同语言。如今年在桑榆，懂得了宽容，习惯了多元，对我爱而人不爱者，不再势不两立；但对我爱人亦爱者，依然“兼及屋上之乌。”比如我尊崇蔡元培，你也钦仰蔡元培，那你我之间便有灵犀，得以沟通，那一切就都好商量了。所以当周素子回到新西兰，给我打来电话，要我为她一本将要出版的集子《晦侬往事》作序时，我一点也不考虑我是否合适，竟毫不犹豫地一口答应了；尽管我已不再为人写序，怕才疏学浅，佛头着粪，可这次显然是蔡元培破了我这一戒，又让我不自量力了。

此后，周素子通过电子信箱发来她集子中的一些文章，我都认真拜读了，不同的读者，会读出同一本书的不同面貌；同一个读者在不同的时期读同一本书，也会读出不同的感受。带着满脑子的蔡元培刚从香港回来的我，阅读周女士以上这些精彩篇什时，会读出什么呢？我读出的竟然也是蔡元培！

如我读《求学记》。作者写到她为了争取三个女儿（大幼、二幼、三幼）的读书权利，历尽千辛万苦，饱尝求学之难，这使我马上想到蔡元培执掌北大时的办学之艰。后者是蒙受北洋军阀的打压和封建势力的围剿，而前者则是遭遇时局的迫害和政治运动的磨难。历史经过百年，而对教与学的摧残却一如既往，只是戕害之形式有变。但百年前毕竟尚有蔡元培，而今蔡元培又何在？在大幼、二幼、三幼的儿童时代，蔡元培已是远逝，而在当今的中国蔡元培更是无影无踪！

大幼、二幼和三幼的童年所幸有一个像作者这样的母亲，她竭尽全力护卫孩子接受教育的权利，得以在那种畸形得疯魔的岁月能够完成他们的基本教育，这真是奇迹，也是母亲的伟大！尤其令我非常惊异并给予极大敬意的是周女士非但完成了三个孩子的一般教育，还辅以在当时几乎已经完全灭绝了的美育，作者写道："二幼的学校功课我并不过问，我要求她一定要成绩优良，而且我给她的课外作业不轻。每周我从乡下回来，一定要严格检查，我布置的课外学业为参加业余绘画班。每周背一首古诗、一首词。每日一篇日记，一大张毛笔字，十张速写。后来还增加了乐器琵琶的练习……"作者对三女儿三幼也如此，她写道："我布置三幼的课外作业是每天写一大张毛笔字，她们的书法老师，是我们近邻当代大书法家沙孟海先生。另外还学习古筝、古琴。"这都使我想起蔡元培先生对美育的高度重视。

蔡元培 1917 年就首倡以美育代宗教说，1919 年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又大声疾呼"文化运动不要忘了美育"！他一生宣扬美育，终生不渝。他认为通过美育，可以培养高尚的精神、健全的人格。蔡元培提倡美育，起先是为了在那视科学为万能而人类已开始物化了的时代，找回失落了的人之所以为人的人文情怀。而周女士在那人妖颠倒、黑白混淆、善恶不辨、美丑不分的时代，以待罪之身，对三个女儿厉行美育，显然是为了人生的美丽和尊严；这是真和假、善和恶、美和丑的搏斗，这一搏斗令人震撼，感人至深！这需要坚强的毅力，沉稳的勇气，才能使自己的柔弱之肩荷起沉重的剑戟，戳开毒雾弥天的黑暗，去追寻美，哪怕是追

寻到一句古诗的美，一张速写的美，一个笔划的美，一声音符的美！所幸，她的孩子们追寻到了，他们的母亲胜利了！

我相信周女士读过蔡元培，相信她带领孩子们在追寻美的长途跋涉中，她的这个前辈乡贤给过她始终不渝的推动。

读过周女士的其他文章，除了同样地深受感动之外，还感到作者是个具有中国传统美德的女性，比如，她千辛万苦，为父母营葬，并请她的老师撰写父母墓表。墓表中写道："素子最贤，双亲饰终，奄穸力任肩系，克尽孝道。"又如，她先生说她："我与素子走在一起，患难与共。……得她毅力和情志以支持。"再如，她对友人、同事甚至邻舍、村民亦非常关切，为此还写下了《扬州箫韵》、《女诗人张雪风》等深情文章。她在《河头人物》一文中说："离开河头已经三十年了，时时回想起河头善良的人们，尤其是几位善待我的老者，计算时日或许已经不在人世了。有几位当时的中年人，也应该儿孙绕膝了，谨以此文纪念他们。"她不是一个人一走茶就凉的人，是个知恩感恩的人，是个私德和公德都很纯正的人。私德尽失，何论公德？这又使我想起蔡元培在北大创建的"进德会"，蔡元培说："吾人既为社会之一分子，分子之腐败，不能无影响于全体。""私德不修，祸及社会。"所以他提倡"进德"，以绳己、谢人、止谤。作者的道德力量显示出其人其文是统一的。

鲁迅论《红楼梦》："单是命意，就因读者的眼光而有种种：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但话又说回来了，如果非是博大精深的《红楼梦》，而是一看就见底的肤浅之作，怎能让各种眼光的读者看见那么多不同的命意？也正因为《晦侬往事》思想内容的坚实厚重，才有可能让我这样的读者，从中读出了蔡元培，我相信其他读者也会从这本书中读出他们各自不同的特殊的感受，我还相信不论什么样的感受，都不会失望，都会有很大的收益。

二〇〇八年十一月九日上海善作剧楼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第一辑



故　乡

我的故乡在浙江省乐清县大荆镇。这个古镇处于浙东名山雁荡山的东麓，在雁荡东外谷风景区内。雁荡山沿东海乐清湾，有三座古镇，大荆镇是其一；中部的称白溪镇；西外谷的称芙蓉镇，即是晋高僧诺距那到此时，说的芙蓉、雁山是“花村鸟山”的含义所在处。雁荡山属闽浙括苍山脉，这条山脉绵延到东海之滨，伏海再起的就是散落在海中的诸岛屿。大荆古镇是一个小盆地，过去的年代，交通不便，与邻近县治都间隔着崇山峻岭，即使在海边，除了渔船，也没有海运。是个既闭塞、又纯朴的地方；且属景色秀美的雁荡景区，这个古镇有着独特的人文渊薮。

古镇地形北高南低，离海只有三里，却看不到海，那座像屏风一样的荆山挡住了视线，挡住了海风的直入，有极佳的风水地理。荆山上长满了荆树，山由树名，村以山名，所以荆树对我来说特别的亲切。雁荡山的北麓有若干条清澈、湍急的山溪，所有的溪水都汇集到古镇西北部的石门潭中。这个潭的水面广可数十亩，两岸崖壁峭立，像两扇门户，潭水有三十多米深，清澈但不见底。潭水下流，即是镇西宽阔优美的蒲溪，在岸边，在浅滩上长满了枫杨。在我童年时，两个哥哥游水，我就在枫杨丛中等他们上岸，为他们照管、晾晒湿衣裤。水上时有从雁北卓南乡、沸头乡划来的竹筏，载着鸬鹚，绕荆山驶流到海边的水涨村去。

大荆古镇的东边，有东门溪，没有蒲溪宽阔，然而居民赖此洗涤，生存。古镇中部，在密集的居屋与街巷间还蜿蜒着一条城河溪，

它常潜流穿越居民的住屋，偶尔又在闹市、住宅之间露出清流，能时时见到街边、屋间有拾级而下的石阶，供人就近洗涤。就在我家的后客厅，也有一个半在室内半在露天的鱼池，有暗沟与外边溪水相通，有矮石墙与后院隔开。池边矮石墙下长着一丛茂盛的野草莓，人们采不到它，就像周敦颐的荷花一样，可远视而不可近玩。古镇的中心是一座小山，上面建有一座高高的魁星阁，魁星左脚立地，右手高握着一杆笔，正向有文运的人们头上点去。在我小时，小山头是商会所在，古樟蔽天，游廊相连，是个幽雅去处。山脚下有一个湖，称为城里湖，种植荷花，岸边是垂柳，与城河溪相连，溪水自北门来，穿石板桥下，将水先汇入湖东人造的石堤内，曲折环回，再穿一座桥注入湖中。据说在春天溪水暴涨时，可以缓冲，这是水利措施兼美化的设计。人们说溪水绕小山而行，按风水上说是“龙抢珠”，我的老家住宅就在龙腹东边！

这三条溪水，在镇的南边，荆山北麓汇合后，绕过西麓，回流入海。三溪交汇处，冲击成深潭，有大漩涡。在我家的楼头，向西南望去，就是雁荡山东谷的突兀山峦，冬夜会看到闪烁的磷火绕山而行。靠谢公岭脚，有一座巨大的“接客僧”岩，若身披袈裟，合掌向内，从谢公岭角度看为“老僧拜钟”，非常酷肖而有名。徐霞客三游雁荡，都是从天台山方向而来，他在游记中对“接客僧”岩有所描述。他在进入雁荡腹地之前，于大荆古驿休息、进餐。他大约是在必经之地蒲溪桥头的饭店吃饭吧！在我童年时，蒲溪桥头还有“王三玉饭店”，老板的女儿还是我的小学同学哩！

雁荡山的百二奇峰、三十六洞府，是亿万年海水侵蚀所致，它的美，早在魏晋之际已被人欣赏。谢灵运任永嘉太守时，就曾经来游览，写下了咏斤竹涧诗，相传他曾深入到东外谷，这条他走过的岭，后人遂称为谢公岭。然有人说，岭东有谢家岙，故名。岭离大荆镇只有五里路程，翻过谢公岭即是雁荡的腹地灵峰、灵岩了。

因为古镇的背山面海，外有乐清湾的天然形胜，使它在军事上成

为要地，它是元代沿海三十六沙城之一，设有大荆驿站，明初改称岭店驿。我的先祖就是于明时迁居大荆的。清道光《乐清县志》载，康熙元年筑有大荆城墙称为大荆营，有参将驻守，雍正二年改为游击驻守，乾隆廿年改为都司驻守，下置守备，并有千名战守兵。大荆镇有完整的城墙城门，在南门外还有练兵的“大校场”，建有“演武厅”与“鼓亭”，城内设有“射圃”、“火药局”、“军器局”。原有的大荆古城墙，是以土夯而成，城围周长 287.9 丈，宽厚 1.47 丈，高 1.4 丈。砖砌城垛有三八九个，城楼四座，也是砖砌。可惜的是现在城墙城楼已毁圮，只留有两座城楼土基遗址，其中一处，就在我家后园井台北面，长有乔木，我儿时与哥哥们常常上去玩耍。东门一带还能见到残留的城墙遗址。如今镇上多现代建筑，但在东门，仍然保留有完整的石板大街，还有两座拱形避火墙圆洞门，这是仅存的完整古建。大荆古镇原有二十五条巷弄，现在仍然袭用旧名，但大多不再是卵石铺地了，原先那种黑瓦双檐石块砌墙的古民宅也渐渐地不多见了。

原城内北街建于元明旧址上的清康熙年间都司衙门，重门叠户，大门之内建有左右二碉堡，并亭台楼阁，游廊轩馆，遍植香樟、茶花、梨、枣、竹林，且建有多处鱼池，还有供练习骑射的“小校场”。这座建筑群，在民国初年，已归为我家所有。我家原住东门隔溪。大伯父周六介公就读上海政法学校时，参加了辛亥革命，屡立战功，光复南京后，除授为杭县（即今杭州）知事，这就是我家与杭州的渊源了。我的祖父周莲波公在老家，因原宅过于简陋，他亲到南京向临时政府申请，购买这所已经颓败的都司衙门旧居，以廉价获得。于是祖父大兴土木，拆除碉堡等军事设施，改建亭榭，增设住宅书馆，再广植果木、园艺。大伯父再于杭州物色古董、字画、图书运至故里，俨然成为古镇世家，祖父改题居处为“晦侬别墅”，以诗礼、耕读治家。衙门的刀光剑影，已成为蕴藉的诗情画意。在我儿时，祖父早经去世，大伯父亦已逝于杭州任上，家庭已渐趋败落。但是藏书依旧，每年夏天在小校场、游廊等处晒书、晾书，让孩子们看管着，大都是线

装书。在入学前，我平生最早读的书，就是晒书时看的《山海经》图录了。非常值得惋惜的是，五十年代初，提倡阶级斗争，我家被划为地主，房产土地被没收，从此告别故居。我在少年时期跟随二姐到了杭州继续读书。一九八二年，在我历经九死一生的颠沛流离，于离故乡三十二年后，才又随昌米哥回到故乡寻梦。我俩先住在雁荡山旧净明寺侧友人家，唐诗所云“近家情更怯”，我们简直不愿再看到故宅旧址，恐怕一见现状，会失去原先保留的完整美好印象。但是故园近在咫尺，能不亲临凭吊？古宅已成为酒厂，我们只在大门外瞻望，在后门三官堂一带逡巡，并未入内访旧，因为所有故物已面目全非！虽然家破人亡，但是故乡山川风貌，依稀犹昔。

元代的学者、诗人李孝光，是我们的同乡人，他曾隐居雁荡山五峰下，然他的故宅已无可考，也从未有人考证过他的后裔。镇北南闾乡，有明礼部侍郎章纶故第和墓园，墓道两侧的石翁仲仍然完好，南闾乡街道上还保存五座其宗族明代木牌坊，其斗拱、重檐，重彩绘制，仍经子孙们时时修葺，这是研究明代建筑学的宝贵资料。如此完整集中的古牌坊群，在浙江山区，已是硕果仅存了。这里还留有“文革”时期章纶的子孙，为了保卫这五座牌坊，与从乐清县城赶来进行破坏的红卫兵展开斗争的故事。二〇〇〇年夏，我和陈朗回国时，三幼一家四口也从德国来，偕同到故乡扫墓。我是于一九九一年归葬父母于雁荡山游丝峰壁的。此时我们重游南闾乡瞻仰牌楼，还观看了崇山之下的章纶尚书第和他的书楼残址。童年，我曾在南闾堂姐家，住过半年。

这一次在老家，在族侄周其钧家看到了我家的家谱。这是在遭受历次政治运动及“文革”浩劫后仅存者。

我哥昌毅以英年逝于一九八六年。他临死前遗言，撒骨于故乡石门潭，并于潭壁摩崖凿刻有“云生大泽”四字。我哥昌米，于一九九〇年在石门潭右坡凤凰山麓建造了荆庐别墅，由沙孟海书“荆庐”二字，由杭州青年画家、篆刻家吴静初镌刻于屋侧山坡之上。荆庐高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